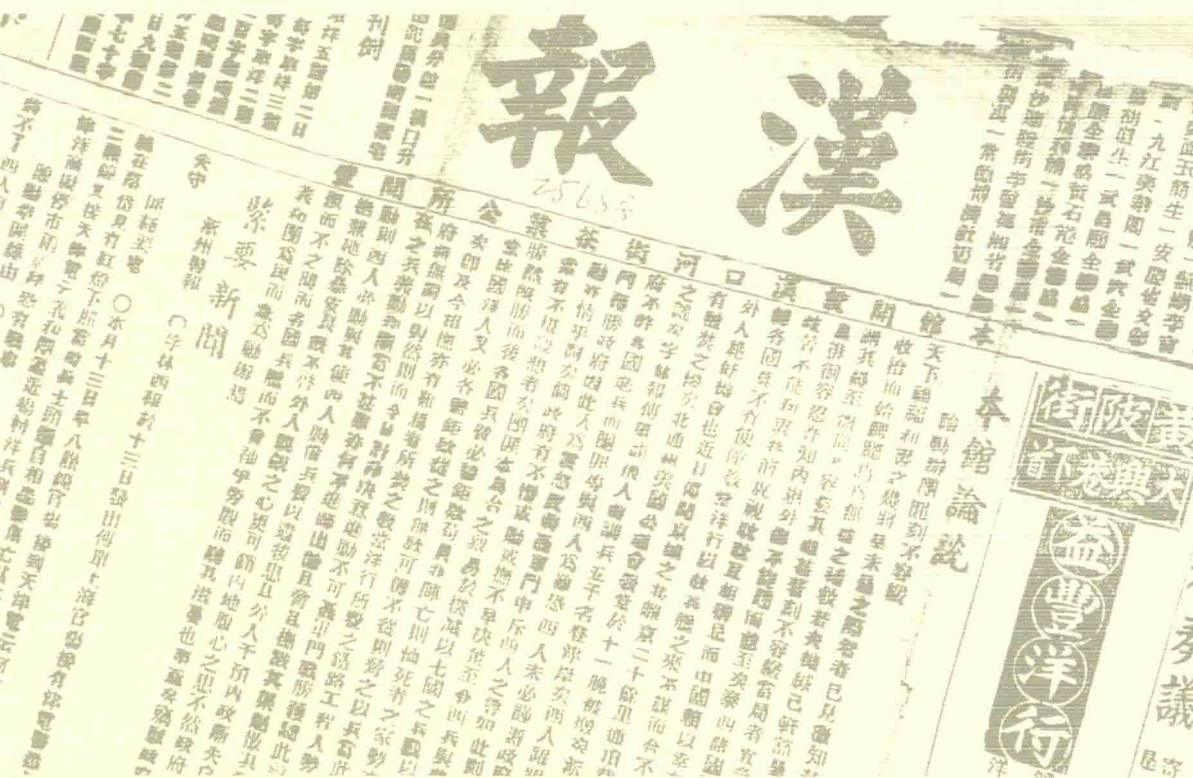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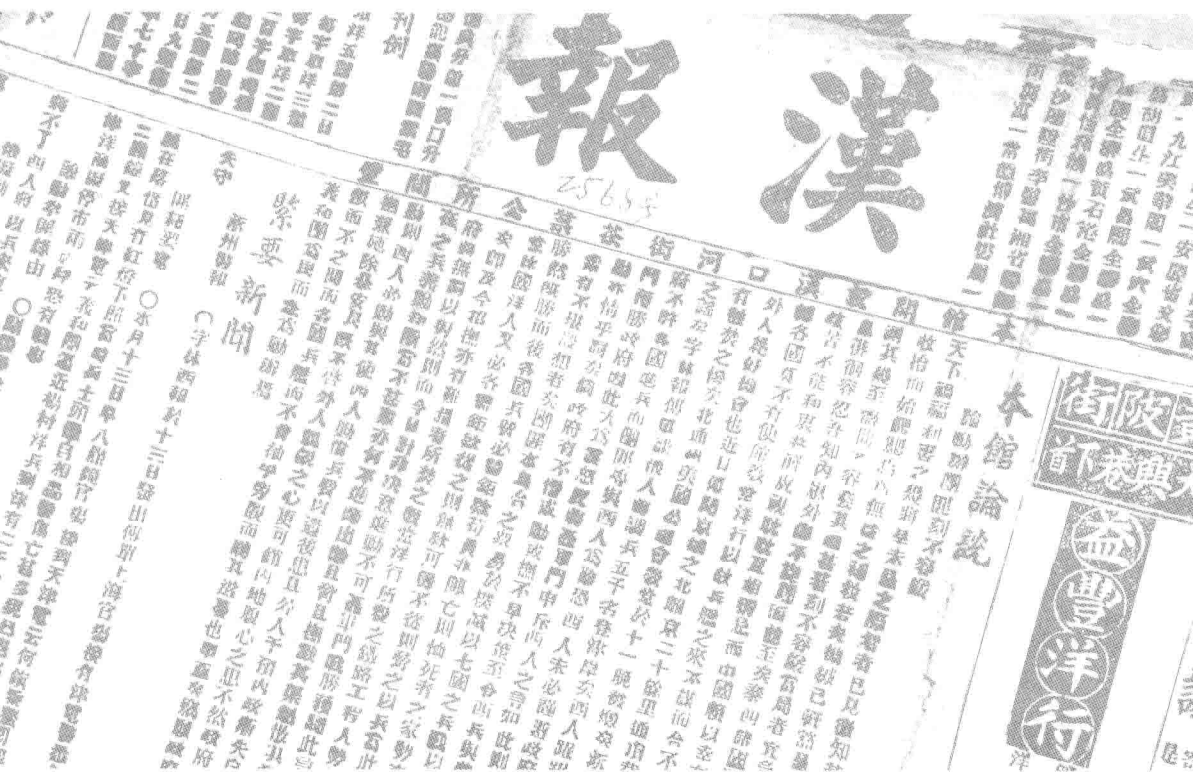
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汉报》 (1896—1900)研究

阳美燕 著



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汉报》 (1896—1900)研究

阳美燕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汉报》(1896~1900)研究/阳美燕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3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

ISBN 978-7-5161-5408-3

I. ①日… II. ①阳… III. ①报纸—研究—中国—1896~1900
IV. ①G219.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6985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文

特约编辑 易小放

责任校对 曲明

责任印制 李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271千字

定价 4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的出版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批准号13BXW010)资助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总序

程曼丽* [新] 卓南生**

经过一番甄选与琢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即将陆续出版。它既是学会复会六年来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的集萃，也是吾辈向创会前辈敬献的一份厚礼。

历史上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由时任校长蔡元培亲自发起并担任会长，他同时聘请留美研习新闻学归国的徐宝璜、《京报》社长邵飘萍担任研究会的导师，这三人也因此被称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三驾马车。

蔡元培校长亲自起草研究会章程，确立研究会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学会拟定的章程、宗旨，学会开设的课程，出版的刊物、教材，成为中国新闻学科建设最初的范本，也使北京大学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摇篮。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很多是当时的进步学生，其中的一些后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有一些成为著名的新闻人。据史料记载，在获得证书的55人中，就有毛泽东、罗章龙等人的名字。这段往事已经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2008年4月15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按照惯例，许智宏校长任会长，并聘请首批10位海内外学者担任研究会导师。《光明日报》用整版篇幅介绍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历史及恢复成立的情

*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执行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

** 卓南生，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兼副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况；人民网对导师聘任仪式进行了全程直播报道。

恢复成立后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一方面继承和发扬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力求开拓进取，创造新的业绩。

复会以来，研究会连续举办了五届年会，主题分别为“纪念五四运动 90 周年暨五四时期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东亚新闻学与新闻事业的回顾与反思”、“新闻史论教育与研究面临的难题与困惑”、“如何研究新闻史？如何弘扬学术精神——以《新闻春秋》公开发行为契机”、“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与主体性的再思考”。

复会以来，研究会传承历史，连续举办了五届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截至 2013 年，毕业学员达到 100 名。学员来自国内三个新闻机构、一所海外大学和 64 所国内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大学、湖南大学、厦门大学、广西大学、西北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等。2011 年，特训班学员自行成立了同窗会，2012 年和 2014 年又相继成立了两湖分会和东北分会。

复会以来，研究会与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 40 多次北大新闻学茶座。光临茶座的有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学者和业界人士。茶座讲座的部分内容刊登在《国际新闻界》、《世界知识》、《参考消息》、《新闻春秋》、新加坡《联合早报》等报刊和财团法人卓越新闻基金奖的网站上。近年来，北大新闻学茶座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中青年学者、学子，形成了一个跨国、跨界、跨校、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

复会以来，研究会出版《北大新闻学通讯》13 期（第 14 期正在编辑中），并且开设了专门的网站（<http://ioj.pku.edu.cn>）和专门的公共邮箱（iojpku@126.com）。

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基础上，2013 年 7 月，学会成员首次走出国门，与韩国言论学会联合举办有关两国媒介产业发展的研讨会，搭建起了中韩两国学者可持续交流的平台。

2013 年 11 月 9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支持下，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举办了“十年再出发——中国新闻发布实践与创新论坛”，各部委十数位新闻发言人与会并围绕如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人民网、中国网全程直播，《人民日报》、《中国青年

报》等作了大篇幅的报道。论坛文集《十年——新闻发言人面对面》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复会以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开展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在海内外新闻传播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十周年之际，新闻学著名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方汉奇先生对于北大的新闻学教学、研究作出这样的评价：“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十周年了。她在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方面拥有四个全国第一，加上站在她背后的北大的声望和影响，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已经后来居上，跻身于中国新闻教育的第一团队。希望她脱颖而出，为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发展继续努力，不断作出新的贡献。”（参见方汉奇教授2011年5月29日的微博）2013年12月21日，在纪念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5周年复会五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方汉奇教授作为学会成长的见证者，在发言中强调：“从复会到现在，会员们对新闻理论与实践中的众多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复会后五年的工作已经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期待她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即是研究会复会六年来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的全面展示。它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经典新闻学著作的再版，研究会导师的研究成果，特训班学员的优秀成果以及研究会学术活动荟萃。我们的初衷和心愿是：通过“文库”的出版，贯通“古今”，延续血脉，传承薪火，砥砺前行，让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对吾辈而言，这也是一份历史责任。

2014年10月14日

复会六周年纪念

序

“要先有问题意识与明确的研究方向和题目，才去尝试轻敲研究生院的大门”，这是上世纪 60 年代末笔者本科毕业投考硕士时非成文的“考生须知”的基本常识，也可以说是当时日本各高校对考生要求的首要铁则。由于研究生院的定位是培养学术专才与确保大学的教师阵容与梯队，各高校从硕士班（基本上是硕博连读）招生开始便卡得很紧，每年各专业仅招收若干名，如无适合考生，宁可宣布“本年度录取者为零”。

也许是受到学生时代日本严谨学风的熏陶和影响，1989 年，当笔者从报界转入学界时，尽管有“好为人师”的热情与欲望，但绝不以降低学术要求录取学生。特别是作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首名外籍专职教员，更不能不十分谨慎，严守此严正的学风，以免有“外国人教员包庇外国人学生”（因投考者多为留学生）之嫌。也因为如此，尽管有不少“慕名而来”的中国留学生曾到我的研究室商讨攻读硕士的问题，但在简短的对话之后，我都不轻易鼓励他们投考，原因是来者几乎都没有基本的“问题意识”。

1994 年转至京都龙谷大学之后，尽管日本学界对研究生的定位已有从以往的培育少数学术精英逐步转为大量生产专才的征兆，但对于录取没有“问题意识”的学生，笔者基本上还是采取消极的态度。

2000 年，笔者利用学术年假，有幸在北京大学度过了一年愉快的客座教授的校园生活。通过课堂的交流、演讲会的互动、课堂后与同学们的热辩，以及谈不完的学术乃至中国社会的众多话题，我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大学生求知欲的强烈和探求真理的精神，相比当时已逐渐消失“梦想”

的日本大学生,显然有着明显的差异。记得那年严冬在未名湖畔的雪境中接受新加坡电视台《焦点30分》的专访时,我毫不犹豫地表示:“北大的学习热忱与求知精神远在东大生之上。”

不过,当时我也很惊讶地察觉到,尽管北大生学习热忱高、思维敏捷和开放,但从他们交来的期末报告等来看,未经思考的整合性、非原创性的论文占绝大多数。说白了,同学们都欠缺“问题意识”,基本上都不是带着问题去写论文或报告,而是在等待老师的指示和分配研究题目。推究其原因,是与长期以来中国推行“计划经济→计划研究”的体制与学术界的风气和习性分不开的。

了解了中国大学生的特征与研究困境之后,笔者对于此前不少抱着“老师,您研究什么,我就研究什么”或者等待老师分配研究题目的留学生,就不再那么反感和感到“不可思议”了。

为此,笔者开始积极招收留学生,并摸索指导留学生撰写论文的途径。方法当然不是任意分配研究题目,而是在和研究生不断的对话过程中,逐步发现他们的研究方向、专长与兴趣,然后鼓励他们大翻书、乱翻书,进而引导他们从中逐步得出自己具体的研究对象。

2004年,受时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吴廷俊教授的委托,我接受他的博士生马嘉(现任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到龙谷大学进修数月,并承担副指导教授的任务。以此为契机,笔者在龙谷大学深草校区旁侧具有传统的喫茶店“绿”,每周一开了一门以讲华语的师生为对象的讨论课。这门义务的讨论课没有学分、不拘形式,有时是让硕士生、博士生轮流发表自己研究的个别章节;有时是共读一本书,类似读书会;有时则探讨热门的新闻话题。每堂课的重头戏是在自由与坦诚的氛围中交换意见与点评。特别是通过对硕士生、博士生论文逐章或逐节的发表与相互点评,我对中国留学生的问题意识与写作能力和技巧有了深一层的认识。这门每周一晚上约两三个小时的课外课,一直延续到2010年3月我提前从龙谷大学退休为止。出席者一直保持在10人以下,除了我在龙大直接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也有个别的本科生)之外,还包括历年在不同时间段我邀请到龙大长期访学的中国学者和到龙大交流、由我接纳并指导的中国大学在籍博士生等。

也许是因为有着上述的机缘,我已较有指导中国研究生的自信,也很乐意成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兼职博导。本书的作者阳美燕同学,便是我在华

中科技大学以我的名义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

当然，与在京都每周定期和研究生见面、随时得以交流的情况相比较，仅靠“集中讲义”的远距离指导确有其不同的难度。好在我对中国大学生的基本思维及优缺点已有一定的自信和掌握，因此，在初次见面、了解学生的基本思路和兴趣、愿望之后，我并不为学生“问题意识”的不明确感到惊讶或困惑。我的第一个建议是先到图书馆大翻书、乱翻书，先对我们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现有的研究状况与成果有个轮廓的认识；其次是，也许因为我是搞新闻史出身的缘故，我对研究生的基本要求是，不管未来的研究方向是否与新闻史直接挂钩，一定要对新闻发展史有个鸟瞰图式的认识。

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也布置了一些作业，其中包括梳理两湖新闻事业发展史的系谱（考虑到阳同学的乡缘及其求学所在地的因素）。

在发现阳同学对研究两湖新闻事业甚感兴趣之后，我让她整理了两湖报纸原件的存佚表及其收藏与保存的情况。因为，在我看来，如果是要搞新闻史，一定要接触原件或准原件，单凭想象或人云亦云、再加上一些与亚洲或中国时空风马牛不相及的所谓“理论”的华丽包装而炮制的“研究成果”是不靠谱的。《汉报》研究的这个选题，便是阳同学在历经上述过程和奔波与浸泡于不少相关图书馆之后敲定的。

在敲定了研究题目与确保了基本研究对象（原件与准原件）之后，除了得认真、仔细阅读这些原件（或准原件）之外，还得对两易其主的《汉报》之创刊背景、外人在华办报的目的及其传播技巧与对象有清楚的认识。要达到这一点，必少不了一番对中外关系史的恶补。换句话说，如何掌握时空的基轴、紧抓时代脉络的主线，是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几经波折，我发现阳同学都一一克服了其面对的难题。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觅得大量的原始资料与明确其研究定位之后，阳同学可以说是全神投入其研究工作。在几次研讨会的短暂见面期间，她都拖着内藏不少原件资料的笨重行李同行，目的无非是随时可以将资料取出，以便讨论。阳同学认真钻研、不懈努力的精神，也为她近年来在学界逐步受到认可奠定了不可替代的条件和基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即见证了阳博士对学术的忠守、务实和努力的成长过程。

二

以上着重谈论笔者参与指导中国研究生撰写学术论文的一些机缘与感想。接下来,我想谈谈本书作者研究《汉报》面对的难题、被赋予完成的任务和取得的成果。

首先是理清该报的一些基本情况,包括两易其主及报名的来龙去脉。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作者基本上可以说充分利用现有材料,回答了该回答的问题。特别是有关英资《字林汉报》的介绍,尽管现有的原件只有两份,却由此可让我们窥见该报面貌之一斑。在新的原件尚未被发现或发掘之前,研究者能觅得并将这尚未被充分利用的珍贵原件“啃得一干二净”,其实就是一个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报史研究者不该将原始资料的残缺不全视为畏途,恰恰相反,如何充分利用这残缺不全(在不少的情况下,这是报史研究者面对的常态)的原件,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线索和答案,无疑是考验研究者的学术素养和嗅觉之处。

其次是如何为日资《汉报》这一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给予明确的基本定位,应该是本书的中心内容和是否有说服力的关键所在。这既得对当时的中日关系、日本的“北进”政策与日、英、俄等国图谋在中国角逐其“国益”错综复杂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还得透析日本“大陆浪人”的本质及其为配合日本国策,如何利用中文媒体展开舆论诱导的使命、技巧和功能。说得更加明确些,日本“大陆浪人”在华办报,与19世纪早期的传教士报人“学了中国人的口气,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方汉奇语),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各有其话语体系、献身精神并各为其主卖命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西方传教士报人身兼政教商和媒体人等多重身份,日本谍报人员则直接或间接向外务省、台湾总督府或情报组织部门等定期或不定期汇报、领取资金或补贴,其办报动机和目的,不言而喻。不同的只是,日本“大陆浪人”使用汉语的能力和水平远在一般洋“中国通”之上,他们所办的中文报对中国的旧知识分子(特别是力图改革但苦无出路的维新人士)具有更大的迷惑力和欺骗性。

就以在甲午战争后诞生的日资《汉报》来说,正如作者指出一般,该报所标榜的“汉报主义”(即“一、介绍日本之实情于支那之官民,以令其信于我;二、明唇齿相依之义,行一脉相承之实;三、抑制旧党援助

新党，以助维新之气象”），其首要目的无非是要通过大力宣传日本的先进和强威，激发中国人的“师日”之心和对日本的信任之情，以扭转甲午战争引起的“排日”舆论之不利影响。

甲午战争已时过两个甲子，仔细阅读作者对《汉报》内容的分析，其中不乏迄今仍然值得借镜和警惕之处。在纪念甲午战争 120 周年之际，只停留于“强弱论”，不与“是非论”挂钩的“师日论”，为何在今天仍有很大的市场？不重视历史教训，只着眼于如何“崛起”，高倡“近代化万万岁”的论客，为何仍有人气？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紧扣主线、反复咀嚼和思考《汉报》的内容如何与其编辑方针相互呼应，是本书的看点之一。附录《论析〈汉报〉（1896—1900）馆主宗方小太郎的“中国经营论”》一文，更有画龙点睛之妙，谨此予以推荐。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本书是阳美燕博士为回应方汉奇教授“挖深井，多做个案研究”号召而辛勤耕耘的初步成果和结晶。本书的面世毫无疑问只是她从事新闻史研究、纳入正轨的起点而非结束。

谨此预祝阳博士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卓南生

草于星洲百馨园

2014 年 8 月 20 日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日资《汉报》之前身 ——英商创办的《字林汉报》(1893)与《汉报》 (1893—1896)	(21)
第一节 英商《字林汉报》	(21)
第二节 《字林汉报》易名后的《汉报》	(47)
第二章 日本人接管《汉报》的背景、经过及其编辑方针	(64)
第一节 汉口乐善堂据点与《汉报》的诞生	(64)
第二节 宗方小太郎接收汉口《汉报》的经过及其资金来源	(69)
第三节 日本人接管《汉报》的目的与编辑方针	(72)
第三章 日资《汉报》(1896—1900)的办报理念与特征	(77)
第一节 日资《汉报》的办报理念与使命	(77)
第二节 日资《汉报》的版面形式、发行区域及广告特点	(84)
第四章 日资《汉报》对戊戌变法的报道与评论	(97)
第五章 日资《汉报》关于中日关系的报道及其舆论诱导	(111)
第一节 营造“中日睦邻”氛围	(111)
第二节 宣扬“师日”舆论	(120)
第三节 鼓吹“联日抗欧”论	(127)
第四节 撒播“中日无平等可言”论	(130)

第六章 日资《汉报》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与基调	(133)
第一节 列强施压阶段(1900年3月之前)	(135)
第二节 列强谋划“自行办理”阶段(1900年3月至6月 21日)	(140)
第三节 中外战争阶段(1900年6月21日至1900年8月 14日)	(154)
第四节 善后阶段(1900年8月14日以后)	(172)
第七章 日资《汉报》对俄国南下动向的关注与警惕	(181)
第一节 密切关注俄国“强颜居功”“要素”中国旅大的动向	(181)
第二节 强调俄国“施其权力于东方”之“大患”	(186)
第三节 凸显“英俄相忌”以图牵制俄国之南下	(188)
第四节 鼓吹英日联合共同防御俄国	(193)
第八章 日资《汉报》之落幕	(198)
第一节 《汉报》停刊的经过	(199)
第二节 《汉报》停刊的缘由	(204)
结论	(211)
参考文献	(214)
附录 论析《汉报》(1896—1900)馆主宗方小太郎的 “中国经营论”	(222)
后记	(239)

绪 论

本书以发刊于1896年2月12日的日本人所办汉口《汉报》为研究对象。

这份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源自英国字林洋行1893年3月23日首创于汉口的《字林汉报》，后者系外人在华内地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日报，《字林汉报》创刊不久后改名为《汉报》。英商《汉报》于1896年2月12日被日本人出资买下，自此，日资《汉报》开始其在中国的办报历程，直至1900年9月28日停刊。同年9月30日，中国官宪、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以3000两白银将其接管，这份前后历经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这些中国历史重大转折关头的日资《汉报》遂在中国落幕。

根据相关史料和现存该报原件，本书旨在勾勒该报在中国4年零7个月的发展轨迹。由于该报之前身为外国人在华内地发行的第一家中文日报《字林汉报》，其自身则为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因此，它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在外国人深入中国内地办报的历史、在日本人在华办报的历史上具有十分独特的地位。

外报在中国近代中文报业史上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世界上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就是1815年伦敦布道会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随后，中国境内诞生了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由伦敦布道会传教士1833年创刊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接着，最先开辟“布告”栏、引入广告概念、呈现近代化中文报业经营征兆的《遐迩贯珍》于1853年在英国殖民政府辖地香港创刊，发行者仍然是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紧接着，1854年，宁波最早的近代中文报刊《中外新报》在美国传

教士的主持下诞生；此后不久的1857年，上海最早的中文报刊《六合丛谈》发刊，编者与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以上述五家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中文报刊均以宗教内容和传教目的为主，基本上是以书本式形态每月出版一次，编者为清一色的西方传教士，发行区域则从马六甲等基督教传教根据地逐渐转移至英国在中国的殖民地香港及中国的宁波、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可谓紧随欧美殖民主义国家的对外侵略扩张步伐。通过对这些报刊的考证与研究，卓南生教授将之概括为中国近代中文报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宗教月刊时期。他指出，在这一时期，虽然报纸的印刷和表现能力等都显得格外粗糙，但在介绍西方近代化报刊的概念方面曾扮演着一定的角色。然而，毕竟这些报刊都是由外国传教士为宣扬西方文明、力图改变中国人的对外态度而出资创办的，中国人始终无权过问编务。^①

这种状况直至19世纪50年代香港英文日报《孖刺报》(*The Daily Press*)的中文版《香港船头货价纸》的创刊(1857年)才开始有了突破。自此至1874年中国人出资自办成功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诞生为止，中国近代中文报业结束了宗教报刊垄断的局面，进入所谓“新报”的萌芽与成长期。^②“新报”是当时的报纸为了区别中国传统的“邸报”和京报而常常在其报名上加上的字眼，除了由《香港船头货价纸》演变而来的《香港中外新报》外，同一时期以“新报”命名的还有上海的《上海新报》、汉口的《昭文新报》等，甚至在《申报》创刊之初编者也以《申江新报》自述，可见当时报界的“新报”意识之明确和普遍。以《申报》为例，在创刊时它就以《〈申江新报〉缘起》一文对“新报”之概念作出如下明确界定，“新报之事，今日之事也”，突出引介了“新报”这一对中国人来说全新的传播媒介，强调其作为“日报”的“日新而月异”的时效性；同时在其《论本馆作报本意》一文中开宗明义标榜其“在商言商”的商业性质道：“夫新报之开馆卖报也，大抵以行业营生为计。”^③而实际上，具体而言，“新报”之“新”既在于形式，也在于内容和目的，即不再以书本式而是以报纸形态出现，以报道新闻特别是商业

① 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

② 关于早期中文外报的发展情况，参见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8、9章。

③ 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1979年，第133页。

讯息及发表评论为主，以追求利润为目的。^①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沿袭当时西方日报的体制。这样，以“新报”为倡导，中文商业报纸开始崛起。

“新报”的源头在欧洲，其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则源自鸦片战争后中西贸易的繁盛及随之而产生的中外商人对商业讯息的迫切需求，故其发祥地和据点在香港这一当时中外贸易最为繁忙的商业城市，然后则是对外通商口岸上海，即如王韬所言，“新报之设，始于欧洲，继而及于通商口岸”^②，其出资者多为外人。在港、沪这些地区，以下述英文报为母体，在19世纪70年代相继孵化出如下几家中国最早的一批中文日报：由《孖刺报》（*The Daily Press*）的中文版《香港船头货价纸》演变而成香港、同时也是整个中国最早的中文日报《香港中外新报》，由《德臣报》（*The China Mail*）的中文专页《中外新闻七日报》演变而成最早以华人主持为号召的中文日报《香港华字日报》，由《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的中文版演变而成上海最早的中文日报《上海新报》。这一脱胎于西报的演变历程决定了早期中文日报的如下本质特征与发展动向：由于报纸的出资者和操权者均系洋人，他们在办报方针与立场上必然与其所属英国殖民政府的在华利益保持根本一致，也就是说，早期中文日报必然具有殖民地报纸的色彩，中国人难以过问编辑方针；而与此同时，正是这种殖民地报纸对舆论的控制权反过来又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要求摆脱外国势力对传媒的控制、争取言论自由的自主办报意识。这一时期诞生的《循环日报》就是处于这种背景之下，由中国人自己出资、自己主持成功的中文日报一例。

同时，自19世纪70年代起，在以“新报”为主体的中文外报的成长、发展过程中，中文日报风气渐开，中文日报这一报纸形态和报业概念在中国报界已经初步形成，这可从当时中国士人和报人的有关明确表述中得到见证。例如，王韬写有《倡设日报小引》、《本局日报通告》、《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等文，郑观应写有《盛世危言·日报》篇，陈炽写有《报馆》一文，陈衍写有《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一文，显而易见，他们关于报纸、报馆、报业的观念和主张都是

^① 相关实证分析，参见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8、9章。

^② 同上书，第238页。